



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

The Research on Didactic Localiz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learning Relational Category

宋秋英◎著



科学出版社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目



全球化背景下 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

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

The Research on Didactic Localiz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eaching-learning Relational Category

宋秋英◎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教学论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本土化旗帜下,针对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异域教学(理)论的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本书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按照“历史分析—文化诠释—未来构想”的谋篇线索,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客观需要、往昔境况、当代态势与发展指向,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学论研究的古今相承、中外融汇、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本书既可作教学论研究者参酌之资,又可供一线教师借鉴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问题研究: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宋秋英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9.3

ISBN 978-7-03-056665-2

I. ①全… II. ①宋… III. ①教学研究—中国 IV. ①G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40030号

责任编辑:乔宇尚/责任校对:何艳萍

责任印制:徐晓晨/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33934

E-mail: edu_psy@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9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3/4

字数:255 000

定价: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教学论 (Didactics) 是我国教育学一级学科下与课堂教学实践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分支学科, 近年来逐渐演变为“课程与教学论” (Curriculum and Didactics)。作为师范大学里一个独立的学术性学科 (academic discipline), 教学论在我国教育学发展史上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分支学科, 也就是新近 30 多年的事; 以往, 教学论只是我国师范大学开设的教育学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与德育论和学校管理论等相并列。但教学论引进我国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在这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教学论本土化问题始终是我国教学论学者的一个主要的学术追求, 而且至今尚未完成。

从全球化的视野看, 教学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与教育学一样首先起源于 17 世纪的欧陆国家 (如夸美纽斯的故乡捷克), 尤其是 19 世纪的德国。随后, 德国教育学 (Pädagogik) 和教学论 (Didaktik) 传播到美国、英国、北欧国家、日本、中国及其他许多国家。德国教学论也像德国教育学一样, 主要以哲学乃至神学为基础, 是一门人文学科。尽管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师范学校和大学曾经引进过德国教育学和教学论, 但美国没有传承它们, 而且不久美国教育学就发生了学术转向, 其标志性事件是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美国大学教育学的学科名称由 Pedagogy 变成了 Education。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教育学本土化的肇始, 也象征了美国教育学研究科学化的启程, 由此开启了世界教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主流范式。

通过比较研究, 我们发现: 欧陆教育学 (Pedagogy) 与美国教育学 (Education) 是两种不同的教育学范式, 即前者承认教育学 (包括教学论和学科教学论) 是大学里一门独立的学术性学科, 它主要以思辨哲学为基础, 形成

了教育学研究的“人文范式”；而后者则认为教育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术性学科，而是一个交叉或跨学科的学术领域，主要由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史学等“基础”（foundations）构成的社会科学中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属于教育学研究的“科学范式”。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都缺乏一门基础性的、类似于德国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ädagogik）那样的独立的教育学科。由于教学论是教育的核心部分，美国没有教育学也就意味着没有教学论学科。反之，美国本土开启了课程理论（课程论）、学习理论（学习论）、教学理论和评价理论四个分支研究领域，它们一起构成了与欧陆教育学和教学论学科大体相当的、与课堂教学实践密切相关的跨学科的学术领域。其中，课程理论由于各州和学区课程开发的实际需要而兴起，侧重于课程的组织安排而非课程内容的研究，它把教学（teaching/instruction）研究贯穿其中，如泰勒的名著《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所示。学习理论（学习论）最初由各派心理学家提出，近来又增加了基于脑科学和教育技术的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s），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教学理论以20世纪上半叶的进步主义教学理论（如设计教学法）和20世纪下半叶的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 design）理论为代表，但它们只是研究“如何教”的理论，而把“如何学”的研究让渡给了学习理论；况且美国的教学理论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渐渐从课程理论或教育心理学中独立出来，比起欧陆教学论来晚了一个多世纪。至于美国的评价理论，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在欧陆教学论里，评价理论是教学论学科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正如课程内容研究是教学论的组成部分一样。

20世纪上半叶，从1919年至1949年，美国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界学习和模仿的主要对象。中国教育界由原先取道日本学习德国教育学和教学论，特别是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和教学论，转而学习在美国诞生的新教育学，尤其是杜威的教育理论。从那时起中国教育界就以新旧教育学的表述来区分美国教育学和欧陆教育学（欧洲新教育学派除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有学者试图以课程论取代教学论。但是，许多教育学者似乎尚未意识到，美国教育学与欧陆教育学是西方教育文化中两种不同的教育学传统和范式。如上所述，美国及其他英语国家并没有产生以教师、学生和教学内容三要素（即著名的教学论三角形）为整体研究对象的教學论；它们的教学理论主要是教授（teaching/instruction）的理论。我国有些教学论学者认为，教学论是研

究“如何教”的理论，它与课程论有分工，后者是研究课程内容的理论。其实这是对欧陆教学论的一种误解。事实上，欧陆教学论（包括苏俄教学论）研究的一个重点对象是对教学内容的研究。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克拉夫基提出的教学论分析框架，尤其强调对教学内容及其对学生发展的意义的反思性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与许多同仁一样，我们从比较教育学视角开始反思中国教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石，试图重新确立21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并依据中国自己的教育文化传统，吸收和综合欧陆、英美两种不同教育文化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开始重建既具有中国教育文化特色又面向世界的中国教学论，以便有效地促进当前与今后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仅对教学论学科的反思而言，近年来国内教育学期刊上发表了大量专题论文。但从比较教学论视角进行反思的，似乎尚不多见。教学论研究既有偏离教学论传统（如注重教与学及教学内容的互动）的危险，也未能很好地把英美课程论研究的合理因素整合进教学论研究中。宋秋英博士的这部专著，以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教学论的视角反思近百年来我国教学论的本土化问题，对重建21世纪中国教学论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是切合时代需要的。书中对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过程中“教与学”关系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走向的探索，比较系统深入，富有启发。作为她博士学位论文的指导教师，我希望她的这项研究今后能深入下去，也希望更多关注我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同仁，与我们一起推进我国比较教学论研究，为教学论本土化和现代化做出贡献。

是为序。

丁邦平

2017年8月26日

前言

教学论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学者在教育学本土化旗帜下，针对盲目照搬和简单移植异域教学（理）论的现象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全球化势如潮水般涌来之际，学者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在教育理论视界与课堂实践场域中“师夷长技以自强”“会通中外以超胜”的必要性，纷纷从多维层面、多元路径探寻适合本土的教学良策，力求植根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土壤来检视异域教学理论的养料，以期将萌动蓄发的种苗培育成高大挺拔的乔木，使之无论在当下还是未来的生态林中均能主动吸纳、勃发潜能、互生互融、充分舒展。基于这美好的育化理想，一代代教育界人士在学术征途中悉心钻研、孜孜不倦、矢志不渝，亦把“中国特色教学论的构建与发展”作为不朽的历史夙愿、不懈的学术追求、不变的现实情结和不息的时代心声。

教与学的关系乃是教学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之一，它直接影响着师与生、知与能、文与道的关系模式，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视为教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本书以教与学的关系范畴为基点，按照“历史分析—文化诠释—未来构想”的谋篇线索，从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系统地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客观需要、往昔境况、当代态势与发展指向，倡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达成教学论研究的古今相承、中外融汇、实践创生、国际对话，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本书由四章组成。

第一章主要廓清“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继之从文化哲学中“倡导文化自觉”“主张回归生活世界”“推崇师与生之间生命互动互往”等合理内核出发，不仅阐明既重视世界性因素又强调

民族性因素的本土化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剖析了教与学关系理念的中国式建构是顺应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发展的必然需要。

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追溯近代以来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教学论之教与学关系范畴的学术流变及其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不同的历史阶段中被屡次改易、重新定义、深度影响的发展进程，即考察其“化”于本土的往昔境况与当代态势，不仅呈现出百年来日、德、英、美、苏等异域教学（理）论在中国被引介、汲取及涵化的实然境遇，而且阐释传播至中国的欧陆“重教”学术话语和英美“重学”学术话语影响中国教与学关系构建的实然状况。

第四章在简述教学论概念之源流汇的基础上，阐释教学论学科应以本国特有教学文化场域中的现实问题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承传与借鉴以往教学思维成果和异域理论滋养的基础上，通过考察本国教学过程中具有情境性、人文性的多种多样的教学活动和千变万化的教学现象，来把握本国特定文化浸润下、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教学本质与规律，并提出“重教”或“重学”的教学文化并非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构建适合中国国情与民性的教与学关系乃是当前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为了进一步扩展对教与学关系的理解，以及对教学生命与教学环境关系的认识，本章还从生态哲学的系统观、整体观出发，阐释了教与学关系的中国式应然指向乃是创建以师生生命的发展为要旨、以主体与环境和谐互动为要素、以教与学关系阶段演进为要领的教学文化，希冀形成“无为而教”“学而有为”“师生两忘”的教学生态系统。

本书是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2008年9月，笔者如愿作为教育学原理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走进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这既是一个富于激情、充满希望、蕴涵挑战、促发创新的殿堂，又是拓宽视野、启迪智慧、增长见识、净化心灵的场所，更是春日绿浓、夏日馨香、秋日锦簇、冬日清雅的颐园。于如此之境中，笔者承蒙导师丁邦平教授的悉心指导与至诚教诲，在此衷心感谢丁老师的学术激励和思想启发。同时，感谢徐玉珍教授在课内外给予的谆谆教诲和热情帮助。两位老师渊博的知识、精辟的点解直接或间接地使笔者对中国教学论本土化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他们广博深厚的学术造诣、平易近人的教学风范、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朴实高雅的人文气质将久驻于笔者的心间。同时，感谢劳凯声教授、石鸥教授、徐玉珍教授、王本陆教

授、吕达教授在开题报告会和论文答辩会上提出的宝贵建议，他们深中肯綮的修改意见使本书避免了许多遗漏和偏误。

生态和谐缘于本真自然，满目疮痍往往因之急功近利。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笔者就钟情于满是花草树木的大自然，钟情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美，钟情于没有世俗与功利污染的本真生活。虽然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与范围还远远不能反映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之教与学关系的发展诉求，但撰写的过程却让笔者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也希望极具审美精神的生态思想使人们深深体悟到博大精深的教育研究领域，还有别样的清新天空、教学美景。

宋秋英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化”之客观需要	1
第一节 “本土化”词源释义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	2
一、“本土化”词源释义	2
二、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5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必然性分析及其内蕴	8
一、从世界教学论发展史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必然之择	8
二、本土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发展的必然之需	14
第二章 “化”之往昔境况	22
第一节 引介“重教”的日德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24
一、日德教授法的传入	24
二、本土化的意识萌生	27
第二节 借鉴“重学”的英美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38
一、英美教学法的传入	38
二、本土化的思想认同	53

第三节	形变“重教”的苏联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74
一、	苏联教学论的传入	74
二、	本土化的基本确立	82
第四节	自创“重学”的本国理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规制样式	110
一、	断绝异域理论传入	110
二、	本土化的规制样式	115
第三章	“化”之当代态势	127
第一节	广纳诸类教与学关系论：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128
一、	东西方理论的传入	128
二、	本土化的多维拓展	132
第二节	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进程中的困境分析	157
一、	倾向于教的教学论话语与倾向于学的课程论话语的纷争之困	157
二、	倾向于学的现代教学模式取代倾向于教的传统教学模式之困	162
第四章	“化”之应然探析	170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应然之探	171
一、	“教学论”概念的源与流及其汇于中国之简述	171
二、	中国“教学论”应然表述及其本土化应然阐释	192
第二节	中国教与学关系范畴的本土化研究应然之析	196
一、	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核心理念	196
二、	中国教与学之应然关系的主要特征	203
结语		207
参考文献		210

“化”之客观需要

在中外学术界，论及“全球化”渊源的说法不胜枚举。譬如，有的学者主张全球化是初显于人类早期跨地域贸易的“古已有之”的现象（根纳季·久加诺夫，2004）；有的学者将其起始时间定于经济契约关系萌发的11世纪（李琮，2005）；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从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确立的15世纪才开始的（汤因比，1988）；有的学者认为它源自殖民主义国家蓄意掠夺他国资源的16世纪初（贡德·弗兰克，2000）；有的学者力证其发端于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王丽娟，2008）；也有的学者指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由工业资本开拓的世界市场真正催生出全球化现象（庄芮，2000）；还有的学者提出严格意义的全球化发生在以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黄仁伟，肖樱林，1999）。虽然关于哪种说法更具合理性的问题还有待商榷，但毋庸置疑的两点事实在于，作为历史范畴的全球化既是地球村落中诸多民族国家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冲破各类交往界域的产物，又是促进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逐渐融为一体的繁复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作为意义范畴的全球化，既能推动民族国家步入国际轨道以主动共享资源，又会冲击部分地域的传统文化而使其被动地陷于边缘境地。

中国教学论本土化是在20世纪初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发展程度的民族国家主动参与或被动卷入全球化潜流的背景下肇始的。那时的世界贸易已然从西欧、环地中海地区扩展至亚非拉等国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则在东西洋殖民主义者入侵的困厄下被动地接受着全球化的冲击，而学科意义的教学论也开始被引介到中国师范学堂里并逐步踏上“本土化”的严冬之旅。直至改革开放的春天来临，中国教学论才在“内求发展、外谋良方”的教育政策感召下积

极主动地应对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度最深的全球化潮流，并不断延展着其本土化的客观需要与内蕴。

本章以廓清“本土化”的词源释义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为起点，深入探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必然选择，以期为进一步分析中国教学论本土化的往昔境况、当代态势与发展指向提供清晰的思路，希冀凸显其境转意迁的社会价值与时代意义。

第一节 “本土化”词源释义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

一、“本土化”词源释义

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必然解析与现实内涵应以对“本土化”概念的透彻领悟为前提。那么，何谓本土化呢？以中文构词角度看，“本土化”是由名词“本土”加动词后缀“化”组成的。“本土”意为自己国家的领土、当地或乡土。“化”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字形分别为“𠄎、𠄎、𠄎”，其状若二人背对倒立、一正一反以示变化，本义指自然领域中某种事物性质或状态的改易、生成。例如，《周易·说卦》谈及“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荀子·正名》论及“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周礼·春官宗伯》述及“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注疏》阐释“化，犹生也”，且辨析“能生非类曰化，生其种曰产”。《礼记·乐记》中“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的经典佳句力图佐证“化”的极致在于通过两种对峙而互补事物之间的相互磨砺、彼此激荡以获得旺盛的生命力。《礼记·中庸》对“化”的表述即“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说明了“化”绝非一蹴而就，而需要历经“诚、形、著、明、动、变”等一系列递进的阶段。一言以蔽之，“化”的原初内涵不仅在于改易旧有事物的形态，更在于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恰是一种由此及彼、由“是”而“非”的缓慢转换过程。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周易·上经》的“观乎天文，以

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孝经·三才》的“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德义，而民兴行”、《淮南子·主术训》的“民之化也，不从其所言而从所行”、《孟子·尽心上》的“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管子·七法篇》的“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羽也，谓之化”、《列子·说符》的“教明于上，化行于下”、《礼记·学记》的“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春秋繁露·玉杯》的“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蚤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等典籍章句所述及的“化”之引申义概要为人文领域中的“教行”，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再次申明“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增韵》在厘定“凡以道业诲人谓之教”的基础上指出“躬行于上，风动于下，谓之化”。尽管这些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层阶级统治下层阶级的文教策略，但也表明了中国传统观念的“化”具有“上之躬行”示范与引领“下之风行”的动态特征，且唯有付诸群体性践“行”的过程方可成就真正意义的“化”。

“本土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中国可以追溯至西汉末年融汇儒家之“仁爱慈心”和道家之“清静无为”的印度佛教东传史实或更早的时期，但作为一个语词符号则并非由来已久，而是起因于近代有识之士对中西文化之间碰撞、激荡的思索与探讨。一方面，他们思虑着中国文化发展的应然走向，倡导大众携手共谋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之径，促进中华民族的富强、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探求如何从西方文化中“借明于鉴以照之”，在“寸分可得而察”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使中国传统文化焕发时代光辉。基于此，他们纷纷提出“中国化”的构想，间或有“本土化”的提法，但当时并未对之加以确切的界定。

时至今日，“本土化”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语词。在读秀学术搜索网中，以“本土化”为题目收录的文献多达 22519 篇，其中期刊文章 12975 篇、报纸文章 7178 篇、学位论文 1524 篇、会议论文 591 篇、著作书籍 251 种（截止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这些文献资料中，有的学者将“本土化”的语义分析为“使某事物发生转变，适应本国、本地、本民族的情况，在本国、本地生长，具有本国、本地、本民族的特色或特征”（郑杭生，王万俊，

2000)；有的学者将之理解为“人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本民族文化家园的诉求”，从而“帮助人们有效地抵抗文化乡愁 (nostalgia)” (刘晖，2005)；有的学者将之概释为“把外来东西的性质和状况转变成适合本国的、本地的、本民族的、自己所需要的” (韩贺南，张健，2005)；有的学者将之阐释为“将某一事物转换成符合本地特定要求的过程”，同时“显示各种异质多样性和特定情境要素的过程” (陈世联，2006)；有的学者将之解释为“传承和扩散本民族或本地区特色的优良方式：把产品、企业文化烙上本地特色，再流通到其他地方，使本地特色得以扩散”或者“把外来产品、技术掺进本地特色，既可利用本地优势，去粗取精，又可使本地特色加以扩散，一举两得” (王晟，2007)；还有学者将之诠释为“异域异族异质的‘他者’理论在满足本土化的条件之下，经过本土化机制的规约、融合、内化、操作与变革，使外来理论顺利引入、借鉴与转化的本土理论与实践的生成过程” (龚孟伟，2009)。

在英文表达中，“本土化”可用“localization”“nativization”“indigenization”来表达。从构词角度看，这三个词共同的后缀“ization”是由“ize”和“tion”组合而成的，其中源于古希腊语“izein”的“ize”具有“令某物发生变化”的使动含义，“tion”则表示“行动”“状态”“结果”，所以“ization”含有“‘化’的行动、状态或结果”之意。“localization”的词根“local”源自公元300—700年的拉丁文“localis” (属于或关于一个地方)，而“localis”又是从古罗马时期的拉丁文“locus” (地方) 一词派生而来的 (Douglas H, 2010a)，结合拉丁文字义的解释可析得“local”意指“地方的、本地的”，由此扩展至“涉及或限定于某个具体地域或地区的” (Judy Pearsall, 2003 : 832)；“nativization”的词根“native”源自拉丁文“nativus”，本意是“天生的、自然的” (雷蒙·威廉斯，2005)，现代通常被释为“当地的、土著的、土产的”，尤指“与某人出生的地区或环境紧密相关” (Judy Pearsall, 2003 : 949)；而“indigenization”的词根“indigene”源于拉丁文“indigena”，与“native”含义相近 (Douglas H, 2010b)，意为“土产的、本土的、固有的、土生土长的”。总体而言，英文“localization”“nativization”“indigenization”均可指“使某种外来事物具有地方特色或成为地方所属的行动过程”，其行动旨意即“化”的目的在于使该事物的原本性质或初始形态发生改变，以致最终具有本土性，成为本土式。英国东英格利亚大学教授 Timothy R (2001) 认为，本土化 (localization) 是对本民族

“经济、文化和环境施加影响并使其发生改变的过程”，意味着原有矛盾的化解和新质因素的生成。日本学者 Minako H 和英国学者 David A (2002) 谈到，本土化 (localization) 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且其原初内涵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拓展，在当前世界文化背景下，该术语被界定为“通过消解不同地域之间的语言与文化障碍而促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美国学者 Rajeshwari Pandharipande (1987) 从语言学的角度指出，本土化 (nativization) 这一术语在异域社会文化背景中可被概要为文化同化 (acculturation)、本色本土化 (indigenization)、异类混合化 (hybridization)，“用以描述某种语言从母源 (parent source) 中分离、变化、趋异”的过程。Loubser J (1988) 认为，本土化 (indigenization) 意即针对当地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与其他地区建立有机联系而使得自身在解决紧要问题的过程中重获自立自足的能力。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本土化”的概念界定莫衷一是，但均不同程度地秉持着深厚的当地情结和“化”的主旨原则。一方面，本土化是在当地原有基础上经由汲取外来滋养而使当地生发出具有应时特征的新质元素；另一方面，“化”的主旨在于将自身的不利因素“化解”为有利因素，进而生成“非类”并获得新的发展，其本身隐含着以过程的形式存在且以过程的方法展开的根本属性。就广义而言，笔者认为“本土化”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外来事物或思想通过被引介、汲取、重构等方式以适应该地环境、融入当地生活、浸染当地特色、满足当地需求或变易当地行为，并在与当地传统相互激荡交汇中获得新的发展的渐进过程。

二、全球化背景下本土化的必然存在与现实内涵

在以民主化、科学化、现代化为核心主题词的全球化潜流中，学者们基于各自对本土化的过程属性及其与科学化、现代化之间关系的认识程度而提出了纷繁复杂、歧义丛生的“本土化”理解。正因如此，以往的“本土化”研究更多地表现为研究者的个人旨趣与一己偏好，而较少展开自觉的群体性践“行”或社会性活动。

面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度最深的全球化潮流，为了使学术界能在群体抉择和社会取向方面达成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共识，一批学者在探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开始致力于厘清

以全球化为核心主题词的背景下“本土化”的含义。同时，他们试图消弭两种理念指向截然相悖的“本土化”误解，即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就是将具有复合性、趋同性、均质性的“全球化”事物或异域思想直接引进，予取予求、为我所用的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本土化”就是闭门潜心研发独具民族特色的本土事物或原创思想以服务于当地民众，立足本土、自力更生的过程。前者实质在于以所谓的“全球化”取代“本土化”，即误认为强势国家的事物一定具有普适性，且无条件地加以接受，并在追随他国形势的同时断然忽略了对本土文化脉络的分析和优秀传统文化的承续，这在不经意间助长了妄自菲薄、唯异域之马首是瞻的心理；后者实质在于以所谓的“本土化”规避“全球化”，即以原创出与他国相异的事物或思想为基本归依，在抵制强势国家霸权的同时一味地排斥外来积极因素的影响，这就在无形中滋生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两种观点均潜隐着否定本土化的意识，缺乏本土参与的全球化只能使本土由于省却“化”的民族根基等内在条件而成为他国事物或思想的代理者，缺乏全球视野的本土自创只能使本土由于省却“化”的异域资源等外在条件而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边缘者。

为了扭转全球化与本土化在理念层面“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倾向，以及在实践层面“非我即他”的内外失衡局面，美国社会学家 Robertson R (1995) 在《全球本土化：时与空和同质与异质》一书中将日本经济学家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评述日本企业的海外成功战略时所首创的术语“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引入社会学界。他在文章开篇指出，当代社会学家过于关注全球化的宏观议题而很少以本土化的视角洞察微观现象，由此误导人们以越大越好、大而化之的分析框架来抹杀本土甚至历史，使全球化观念成为一种适用于所有时空的“学科智慧”（disciplinary wisdom）。在 Robertson R 看来，虽然趋同性的“全球化”和多元性的“本土化”之间会出现分庭抗争现象，但“本土化”不可能彻底阻挡“全球化”的浪潮，而“全球化”也不可能全然取代“本土化”，两者之间的合理张力、辩证互动则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社会价值。随即他用简练的语言将这个由“globalization”（全球化）与“localization”（本土化）拼缀而成的新词“glocalization”之精髓归纳为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和谐共存，以及同质性与异质性的适度融通。与此相契合，目前跨国公司所奉行的“全球化